

【论 文】

《消失的“国民”

——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序言（部分）¹

王 柯²

本书为近年笔者以“民族”的视点观察“中国”社会，从“周边”的角度检讨“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中文书籍的第四部，前三部分分别为出版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1940年代》（2013年）、《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2015年）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2014年）。笔者之所以重视以“民族”的视点观察“中国”社会，从“周边”的角度检讨“中国”历史进程，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开始于一个由来自“周边”的“异民族”统治的王朝时代的末期，针对“周边”的“异民族”的“民族革命”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转折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也因此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主旋律，更是因为实现对“民族”和“周边”的统治，实为中国从古至今检验统治者是否具有统治正当性的、带有普世价值性质的重要标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礼记》礼运）是也，毋庸置疑，它是源自于“天下思想”的。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普世的价值，是因为实现对“民族”和“周边”的统治被认为是“德治”的物化体现（objectify），“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荀子》议兵）即此意也。因此，笔者以为，以“民族”的视点观察“中国”社会，从“周边”的角度检讨“中国”历史进程，才能够真正体味“历史中国”的丰富意涵，从而看到今天“现代中国”的问题点。

不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向被统治者解释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从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大多的“中国人”其实就来自于历史上属于“周边”、属于“异民族”的集团；而“中华”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正是通过与“周边”和“异民族”的交往才得以造就的。正是因为历史上的“周边”和“异民族”的不断加入，“中国”和“中国人”形成了不断增大的趋势。这种历史趋势的形成，当然与“天下思想”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解释及其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历史趋势戛然而止，“异民族”和“周边”的离反，使“中国”在处理与“异民族”、与“周边”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直不断地遇到严重的危机和挑战。其原因，与20世纪以后中国不得不顺从世界潮流从形式上放弃“天下思想”，而各个政权又积极走上一条自己所理解的建设“国民国家”（实为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道路有关。

对于近代以后、尤其是今天处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产生国家认同，有人说是因为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而又有人说是因为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而带来的特殊感，其实揭开表面可以看出，这两种现象的问题性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缺乏一种实践和真正实现“国民国家”的思想。近代的“国民国家”的

¹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一书的“序言”部分。

²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理想就是实现社会全体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所以无论是“非国民”或是“超国民”，都是出于一种把“少数民族”视为“他者”（other）但是却又不愿让它们自由脱离的思想。中华民国政权没有能够实现对“少数民族”的平等、公平和公正，甚至不肯承认“国民”一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难道不更是这样？处于以上基本考虑，本书希望从认同国家意识的形成与近代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解释、与近代社会关于传统文化的意识、与近代社会的社会流动性、与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与各个政权的政策决定因素等之间关系等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 20 世纪以来“周边”为何拒绝“中国”、“异民族”的集团为何抵制“中国人”意识？或者说他们为何不能或不愿成为中国的“国民”，他们的“中国人”意识是如何被消失或因何而消失的问题？

本书按照历史沿革，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在各个时期中的“少数民族”对中国建立国家认同问题上发生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除第九章之外，本书其他主要内容和章节都曾在各种学术场合发表过，但是为了更加精确地回答以上问题，此次收入本书时又结合笔者多年之思考，再次做了大幅度的修订。全书结构大致如下：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从社会构造和文化系统之间关系的角度，考察传统中国促使具有不同于汉人的独特文化的民族集团对中国产生认同意识的原因。

第一章“从‘穆斯林’到‘中国人’——晋江陈埭丁氏宗族的‘本土化’过程”（原刊载于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现代中国研究》第 30 号，2012 年 3 月，第 1-27 页¹），主要利用“族谱”等地方史数据，通过考察一个原本为穆斯林的群体是如何在中国南方农村社会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中逐渐转化为“中国人”的历史过程，研究传统中国能够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甚至是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社会机制，并从中发现国传统社会中保证平等和公平的社会流动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平等和公平的社会流动在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之意义。第二章“‘回教’与‘回民’含义不同——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原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93 期，2005 年 12 月，第 96-105 页，原名《二重的忠诚——白寿彝和开封的故事》），以 1930 年代的白寿彝先生对“国家”和“民族”集团的“二重的忠诚”为例，通过考察中国文化古城开封对白寿彝思想形成的影响，分析 20 世纪上半期前中国社会中何以能够产生和保持多文化共存的空间，以及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个性的“民族”集团，能够区分个体的“民俗”文化和全体“国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在其形成和保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上的意义。

本书第三章、第四章从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过程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对“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对被视作“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所发生的影响。

第三章“‘汉奸’考——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话语”（原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 83 期，2004 年 6 月，第 63-73 页，原名《“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其增补版刊载于日本岩波书店《思想》981 期，2006 年 1 月，第 28-47 页，原名“‘汉奸’考”），通过考察“汉”由一个文化共同体符号最后变成一个“民族”的符号、“汉奸”由一个满清王朝统治者用来表达与被统治者（汉）同属一个利益集团的词汇最后被改造为对外极端民族主义符号的历史过程，分析 20 世纪初期中国关于“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传统思想之所以发生衍变，以及步入近代之际将“汉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切割的行为，与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之关系。第四章“‘中华民族国家’的‘魅力’与‘凝聚力’——近代民族与近代国家的二重奏”（原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络版，2003 年 7 月；后转载于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60 期，2010 年 1 月，第 1-8 页，原名《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通过考察 20 世纪初设计和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实践，进一步考察受到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影响

¹ 原名「中国南部ムスリム社会における「宗族」の成立と「漢化」——「陳埭回族」の事例を通じて」

的“中华民国”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对“国民国家”思想之理解，为什么影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本书第五章、第六章分别考察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取得政权之后的对少数民族政策，分析中共关于“国家”与“民族”关系思想之变迁，与其理解统治正当性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断裂的‘民族’话语——‘蒙古民族’问题与中共民族政策思想的历史过程”（原刊载于日本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563号，1995年1月，第19-28页¹），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出笼、变化和最后定型之过程与各个时期的“蒙古民族”问题之关系，分析中共决定对少数民族政策之原则，以及为何否定“国民国家”思想，并导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其夺取政权的正当性根据。第六章“从‘少数民族’到‘国民’？——1949年以后的民族政策过程”（原刊载于日本亚洲政经学会《亚洲研究》第47卷4号，2001年9月，第39-62页²），考察和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民族政策的轨迹和分期，探讨其变化之规律和不同时期政策之性质，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的对少数民族政策给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可能带来的影响。

本书第七章、第八章主要根据笔者在中国南方的“回族”社会通过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实际考察几个南方“回族”小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上的变化给“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对传统的认识上所带来的影响。

第七章“‘宗族’与‘民族’——‘民族化’的诱惑与挫折”（原刊载于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中国21》第34卷，2011年3月，第49-70页³），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福建泉州地区晋江市陈埭“丁氏回族”所经历的“再民族化”的过程为例，考察“少数民族”自身对“民族”符号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分析接受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待遇是否与获得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以及陈埭丁氏回族最终所选择道路的社会学意义。第八章“何处是‘传统’？——中国南方‘回族’社会的伊斯兰‘回归’”（原刊载于千叶商科大学，CUC View & Vision No. 41, 2016年3月，第24-28页⁴），从社会学的观点考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南方“回族”社会中出现的恢复“传统”的潮流，分析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推动的恢复伊斯兰“传统”运动之兴起，与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之关系，并对比1930年代由伊斯兰精英所领导的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实践，探讨将“想象”认定为“传统”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意义。

本书第九章“‘民族链’上的维吾尔——中亚突厥语系民族的历史文化意识与国民意识”，以1989年以后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政治过程以及世界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为背景，运用“历史文化同心圆”和“民族链”的观点，动态地分析1989年以后再度掀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在一种跨越国界的人类生态和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与其他的“突厥语系伊斯兰民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互相刺激的“民族链”中，如何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无疑，“少数民族”是否能够建立和保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如何才能让“少数民族”产生和保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20世纪中国在“民族问题”上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本章所提出的超越近代国家主权领域的历史文化同心圆和“民族链”的观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各个“民族”集团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¹ 原名「モンゴル独立運動と中国共産党民族政策の成立」

² 原名「『少数民族』から『国民』への道程——現代中国における国民統合の視点から」

³ 原名「経済開発と『民族』の役割の再発見——『陳埭回族』の事例を通じて」

⁴ 原名「伝統」はどこまで遡れるものか——中国南方の「回族」社会におけるイスラームへの「回帰」

